

# 马修·阿诺德与英国现代文化批评 学科的先声<sup>①</sup>

陶水平<sup>②</sup>

(江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已然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然而，追溯其理论渊源，却不得不从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的先驱者马修·阿诺德说起。身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期与转型期的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较早洞悉英国工业文明在造就物质繁荣的同时所带来的诸多文化问题。他最早提出了对机器工业的信仰与人性完美相抵触的观点，开创了“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批评传统。他首创“以文化代宗教”之说，树立文化的权威，主张以文化理想来建立国家治理的构架。最早表现出跨学科视野，既关注新兴大众文化，从而显示出大文学观念；同时又坚决捍卫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新古典主义文化批评意识。阿诺德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通儒”，其文学批评具有宏阔深厚的文化视野，实开英国现代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之先声，成为英国现代文化批评学科的奠基人。阿诺德的批评理论具有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其巨大影响超越了他自己的国家和时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继续给当代各国批评家以新的启迪。

**关键词：**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文明”对立传统；两希文明；文化宗教；文化批评

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已然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然而，追溯其理论渊源，却不得不从19世纪英国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说起，因为阿诺德是英国现代文化批评的先驱者和奠基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是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诗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家、古典语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著名罗马史学者、拉格比公学校长、牛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马修·阿诺德于184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847—1851年做兰斯当公爵

<sup>①</sup> 本文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研究的学术逻辑与批评实践”(批准号:09BZW002)与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20世纪中西文化诗学流派研究》(批准号:12WX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sup>②</sup> 陶水平(1958—)，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的私人秘书。从 1851 年开始被公爵委任为教育部督学，直至 1886 年。其间十年还以诗名被聘为牛津大学诗学讲座教授（1857—1867）。阿诺德长期担任教育部督学，遍访英伦三岛，对维多利亚时期各地社会实际状态有真切了解。还多次去法国、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教育制度，两次赴美讲学，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在教育改革、文学创作、文学以及文化批评方面均取得较高成就。阿诺德不愧为维多利亚时代极有代表性的文化大家之一（与他同时或前后英国还有卡莱尔、纽曼、罗斯金等著名文化大家），卷入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思想界关于教育、国家、政策、阶级、宗教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辩，其诗歌作品和批评文集在生前就被奉为经典。

阿诺德一生的文化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此后主要从事批评活动。他一生写了一百多首诗歌作品，如《迷途浪子》（1849）、《多佛海滩》（1851）、《夜莺》（1853）等。阿诺德诗歌创作的伤感、哀婉和想象风格深受华兹华斯的影响，但超越了浪漫主义的个人情绪咏叹，而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意识。阿诺德诗歌作品善于把自然景物描写与希腊神话和史诗中的历史故事及文化意象融为一体，意象丰满，寓意深邃，以古喻今，取譬言志，显示出新古典主义的艺术特色。《多佛海滩》是其诗歌代表作。《多佛海滩》创作于诗人新婚燕尔之时。该诗以大海寓人生，悲叹“信仰之海”的潮退和人类的精神困境，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诗歌通篇以一种宁静哀婉忧郁的悲歌曲调，表达了诗人在面对社会生活急剧变革、古代文明沦丧和传统道德崩溃时所产生的忧思，反映了诗人对古希腊传统文化价值的眷恋和对如何摆脱时代精神困境方法的孜孜探索，对后来艾略特的《荒原》等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启迪和影响。阿诺德诗作充满矛盾、张力、反讽、复义的艺术手法对后来的英美新批评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多佛海滩》为阿诺德的文化批评奠定了最初的文化旨趣和底色。60 年代后阿诺德主要转入教育工作以及文学与文化批评。在担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期间，写过大量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文章，做过大量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的演讲。分别结集为《批评一集》（1865）、《批评二集》（1885）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1869）等出版。其中，以收入一集的《当代批评的功能》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影响最大。前者收入伍蠡甫编译的《西方文论选》下册，后者有韩敏中先生翻译的单行本。阿诺德身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极盛时期，但各种社会矛盾也隐含其间。阿诺德不满意 19 世纪前期英国浪漫主义强调情绪和浪漫的诗学思想，而主张代之以“纯正”的人生真理。阿诺德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通儒”，其文学批评具有宏阔深厚的文化视野，实开英国现代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之先声。本文主要以这两部文献为依据，兼及其他文献，探讨阿诺德的文化批评理论的主要思想观点和批评方法及其影响。

### 一 开创“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批评传统

马修·阿诺德登上英国文化和学术舞台之时，正是英国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

时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此时的英国工业、贸易、经济总量和殖民扩张都位居世界第一，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此时的英国也隐含着诸多社会危机。就国内而言，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盛行，社会处于盲目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之中，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富得流油。在财富向资本家聚集的同时，贫富悬殊却在加大，劳工在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而游行示威，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英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阿诺德在政治和经济上属于中产阶级，在文化层次上则属于当时正在没落的贵族阶级。他对英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庸俗世风和动荡局面深感忧虑，称为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就国际而言，法、德、美等国厉行一系列改革，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大有反超英国之势，英国面临沦为荷兰第二、西班牙第二的潜在危机。然而，当时的英国人普遍盲目乐观，而看不到这种危机。阿诺德具有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见识，加之他长年担任教育部督学，对英国各地的实际问题有实际而全面的了解。同时又多次赴欧洲各国和北美考察各国的文化教育，对各国的改革发展新动向有真切和敏感的洞悉。阿诺德的诗学批评、文学批评、文化教育观点即是在对英国国内外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刻忧虑中形成的。无论是他前期的《当代批评的功能》，还是其盛期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都是这种社会关切和文化回应的产物。

阿诺德在当时不惜冒犯主流舆论，对刻板的机器文明和浅薄的功利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以至于被讥为“文雅的耶利米或虚假的耶利米”。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1869）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不等于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

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遇到强劲的对和公然的蔑视。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sup>①</sup>

面对英国人因物质财富急剧积累而盲目乐观、扬扬自得、拒绝接受外来思想，而周边国家却在迅速崛起的社会现状，阿诺德高度警觉其同胞工具崇拜和迷信外部行为的倾向，批评其只重物质利益而对文学和艺术没有兴趣的短视行为，反思并提出了英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及其重建问题。阿诺德指出其同胞的“小家子气”，而缺乏对人性的人生“完整性”的追求。阿诺德以为，外在的工具手段不是人生的内在目的、价

<sup>①</sup> [德]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1—12 页。

价值和意义所在。真正有意义的价值不是物质上的富裕，而是人性和文化上的完美。

那么，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是什么？阿诺德指出：无须去争论“文化”的学院式定义，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所构想的完美，……完美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sup>①</sup>。“美好与光明就是文化所追求的完美之主要品格。”<sup>②</sup>文化即“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行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sup>③</sup>。

反观英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离这种完美理想却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马修·阿诺德认为，他所处时代的英国社会陷入“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失序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的英国人那样，如此起劲地将财富视为追求的目标。人们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那样具有坚定的信念——十个英国人里有九个都相信，我们如此富有便是伟大和幸福的明证了。”<sup>④</sup>阿诺德把当时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英国的三大阶级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讽刺与挖苦，称当时的贵族阶级只注重外在的仪表和浅表的禀赋，如身体强壮、体育锻炼、相貌举止、个人才艺、勇武自傲等，因而是“野蛮人”（barbarians）；称中产阶级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幸福的明证，信奉拜金主义，只图一心赚钱，因而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即市侩）；称劳工阶级粗野蛮干，动辄上街游行，因而是芸芸众生的“群氓”（populace）。总之，三大阶级都染上了庸俗习气，都有这样那样的心灵、知识、道德上的不足，一言以蔽之，即文化上的不足。

阿诺德认为，一个美好社会是不允许乱糟糟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的。阿诺德对当时英国社会上频繁出现的游行示威现象十分不满，斥之为无政府主义，明确表示不能容忍：“无论自由党的朋友们怎样想怎样说，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对无政府状态不能宽容。”<sup>⑤</sup>在他看来，不消除无政府状态，不要说无从建立美好社会，甚至连社会太平也不会有。而文化是消除无政府主义的有效方法。他说，解决问题的“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sup>⑥</sup>。文化是摆脱我们目前困境的得力助手，“我们寻求的用以对抗无政府倾向的‘权威’准则，就是健全的判断力、思想、理智之光”<sup>⑦</sup>。正因为此，阿诺德当时被人们讥为“文化先知”或“文化使徒”。

① [德]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147页。

④ 同上书，第14页。

⑤ 同上书，第195页。

⑥ 同上书，第194页。

⑦ 同上书，第53页。

## 二 率先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诊治英国现近代文化病灶

阿诺德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浸濡于历史主义观点，朝夕受其父托马斯·阿诺德的耳提面命。老阿诺德是一位以研究古代罗马史见长的著名学者和公学校长，为古籍阐释学和德国史学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深厚的家学传统使得阿诺德具有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文化意识，成为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批评家，或者说是一位历史批评家。阿诺德在西方学术史上最早提出“两希文化”说，认为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两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为线索描述了西方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他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诊治了英国近代以来社会问题的病因，认为滋养欧洲文化的“两希文化”传统在英国近代新教运动以来出现了偏差和失衡，即片面张扬希伯来文化传统而忽视了希腊文化传统。因而主张用希腊智性文化补救英国新教社会之精神欠缺，提出以希腊文化疗救英国市俗习气之文化救世良方。

阿诺德以卓越的文化洞察力指出，欧洲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蕴含在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良性均衡之中。希腊精神（Hellenism）与希伯来精神（Hebraism）是组成欧洲文化传统的一体之两面。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see）事物之本相；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conduct and obedience）。简言之，希腊文化追求美与智，希伯来文化追求善与行。严正良知与自由智性构成人类两种基本的本性或能力。“那种驱向行动的能量，至高无上的责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奋，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热忱——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为一种力量。那种驱向思想——作为正确行动之基础的思想——的智慧，那种对于随着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变化着的思想组合的敏感，欲彻底弄懂这些思想并做出完美调适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些可看成为另一种力。”<sup>①</sup>在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互相更迭，智性冲动和道德冲动交替出现——人类的精神史即是如此发展。“和一切伟大精神传统一样，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无疑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类的完美或救赎。”<sup>②</sup>二者不可偏废，切不可将二者对立起来。然而，“在我们（英国）这里，希腊精神往往落到为希伯来精神的大胜而效劳的地步”<sup>③</sup>。近几个世纪以来，以注重行动为理念的希伯来精神渐占上风，使得我们最根本的习性在于偏爱行动而不是思考，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英国社会出现一种盲动和失序的无政府状态。

阿诺德对当时英国社会盛行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功利主义等僵化意识和陈旧习惯给予了揶揄和批评，主张用自由鲜活的希腊精神思想来激活和更新世人的思维观念。他指出：“国人专一不二地、过度地发展了人性的一个方面、人类的一组力量即希

① [德]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

伯来精神的严正的良心，而没有适当地考虑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因素。在他们的心目中，唯一值得顶礼膜拜的是道德品质和顺从与否，而不关心有无智慧的权能。”<sup>①</sup> 清教徒面临的重大危险在于，以为“唯一的不可缺少”的事是严正的良心。阿诺德则认为，没有这种被标榜为“唯一的不可缺少”的事。如果有，那也只能是“人性的完美”，是“美好与光明”，是“一切方面都臻至最优秀”<sup>②</sup>。换言之，人性全面发展才是最重要的。阿诺德认为，人性是一种复合体，不仅有道德的本能和力量，同时还有智性的本能和力量。希腊智慧的美好与光明，固然要加上希伯来精神的道德良心与力量、闯劲和干劲，两者都要唱赞歌。但是，英国社会因受清教主义影响过甚，尤其需要强调希腊精神。阿诺德指出：“在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人群，我们究竟应侧重赞扬（希伯来精神的）火与力还是（希腊精神的）美好与光明呢，那必须因具体时代和具体人群的具体环境和需要而异。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中最体面的中坚分子而言，清教势力现在是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主宰的力量……清教力量喜欢火与力，喜欢严正的良心和希伯来精神，而不关心美好与光明，不在于意识的自发性和希腊精神。既然我们沉湎于火与力而不及其他，那还用得着一日三颂，为其大唱赞歌吗？”<sup>③</sup> “在眼下这个特殊时刻，对于当下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更需要的是希腊精神。”<sup>④</sup> 他呼吁：“我们英国按自由活跃的意识所指引的方向走去，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切方面弥补不足，从而也就更靠近完全的人类完美。”<sup>⑤</sup>

### 三 首创“以文化代宗教”之说，树立文化的权威

维多利亚时期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主流世俗思潮蔚为时代主潮。英国国教（即国立安立甘宗或圣公会）受到不从国教者抨击，以纽曼的宗教改革为标志的牛津运动不但未能抵御世俗思潮的冲击，反而加剧了宗教解体的颓势，各种宗教自由主义和无神论思潮兴起，传统基督教教义受到质疑，导致英国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阿诺德斥之为背离正道、引起混乱的伪运动。为了帮助英国社会走出文化危机，应对法、德、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挑战，避免大英帝国沦为荷兰第二、西班牙第二，阿诺德把医治英国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希望寄托在“文化”的振兴上，提出“以文化代宗教”的文化政治观念，倡导树立文化与国家的权威，主张以文化理想来建立国家治理的构架，培养社会大众“最优秀的自我”和“健全的理智”，力图重建英国在道德和智性上的民族优势，显示出一种重塑人类

① [德]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29 页。

② 同上书，第 134 页。

③ 同上书，第 133 页。

④ 同上书，第 135 页。

⑤ 同上书，第 185 页。

精神的文化担当和使命意识。阿诺德的人文理想主要表现为推崇以古典文学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追求光明与甜美的文化诉求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

阿诺德认为，文化与宗教有着相通之处，即共同追求和实现社会的普遍完美。正是这种相通之处可以使文化替代宗教，承担重塑人类精神的重任。“宗教是人类努力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果，人类通过宗教表现了完善自身的冲动。宗教是表达人类最深刻经验的声音，它批准且赞许文化的崇高目标，即让我们致力于弄清什么叫做完美，并使普天下皆完美。不仅如此，在确定人的完美一般应包括哪些内容时，宗教得出的结论与文化的结论一致。”<sup>①</sup>文化不仅起源于好奇心，而且有高尚的道德伦理动机，追求完美和热忱行善。阿诺德反复强调：“我所谈论的文化是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sup>②</sup>“文化之信仰，是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而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sup>③</sup>文化不仅是一种智性精神，而且也能在实践中通行天下，使文化的美好与光明的品性显示出来，从而使天道与神的意志通行天下。因此，阿诺德的“以文化代宗教”的文化理念堪称一种新的文化宗教。

阿诺德认为，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独特作用。正如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就是下面的文章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sup>④</sup>阿诺德认为，面对英国社会的失序或无政府状态，为避免各个阶级的随心所欲和各行其是，纠正中产阶级只顾拉车不看前路的偏颇，超越社会大众只是满足于普通自我的平庸，必须依靠文化的权威作用。唯有文化能超越功利，摒弃狭隘的阶级、宗派和党派利益，运用超然无执、客观公允的批判性思考，展开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力求如实看清事物本相，从而创造出一股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同时，树立文化的权威，也是人性和谐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阿诺德认为，“在我们全体都成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会满足的。文化懂得，在粗鄙的盲目的大众普遍得到美好与光明的点化之前，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

① [德]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④ 同上书，序言，第208页。

美好与光明的氛围之中，使他们像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sup>①</sup>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一个身子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在普天下人还没有同我们一道完美起来的时候，个人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sup>②</sup>。文化通过观察、阅读与思考等手段，帮助我们理智行事，看清事物的本相，提升国民的智慧和洞察力，公正无私地追求全社会的普遍完美。

文化之所以能代替宗教，担负起拯救精神危机、重建价值信仰的重任，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作为对完美的追求，乃是人类“最优秀自我”的表征。“最优秀自我”相对于“普通的自我”而言，这是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优秀的自我是文化精神的一种人格表征，体现在各个阶级内部的少数“余剩民”（remnant）即少数局外的、异己的优秀分子身上。“每个阶级中都产生了一些人，他们生性好奇，想了解最优秀的自我应是怎样的，想弄清楚事物之本相，从工具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一门心思想关注天道和神的意旨，并竭尽所能使之通行天下；总而言之，他们爱好的是追求完美。”<sup>③</sup> 优秀自我具有博大的人性，其指导思想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

阿诺德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让最优秀的自我（即健全理智）来指挥一切，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不可以普通的自我（或阶级本能或习惯势力）当作显赫的权威。<sup>④</sup> 应当以“优秀的自我”为理想标准来建设一个崇尚文化理想、以优秀自我为基础的国家，以健全理智、甜美与光明填充国家的基本架构，使国家越来越成为表达最优秀自我的形式。“要想让健全理智对个人的喜好有所影响，想让优秀自我作用于普通自我，我们就要给健全理智以公开的认可和权威，尽量在国家事务中体现健全理智，以使之获得更大权力来发挥作用。”<sup>⑤</sup> 必须树立文化与国家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提升和转化社会大众的普通自我，克服各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阿诺德指出，各种政治的、宗派的、党派的、议会的习惯势力只能产生出各种迎合普通自我的思想，甚至是敌对阶级的情绪和偏见。它们“遮住了我们的眼光，使我们看不见还有比普通自我更明智的东西，因而无从获得关于至高无上的健全理智的概念”<sup>⑥</sup>。阿诺德反复提出要借鉴法国和德国，树立文化的理想与典范，建立国家治理的权威性。阿诺德赞赏法兰西学院式的权威中心，而对英国公众中各种文学报刊的多元混杂的相对价值不以为然，认为英国文化界缺乏这个权威的后果是造成文学和文化的混乱。显然，在阿诺德看来，前者体现了优秀自我的权威，后者只有普通自我的价值。阿诺德指出，迄今为止，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制度对于指引人间正道还是必不可少的。应当以国家作为优秀自我之

① [德]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0—31 页。

② 同上书，第 178 页。

③ 同上书，第 83 页。

④ 同上书，第 84—85 页。

⑤ 同上书，第 99 页。

⑥ 同上书，第 91—92 页。



仁慈宽厚而神圣的代言者，奏出优秀自我的最强音。“文化因教育我们对国家抱有美好的希望、为国家企划美好的未来，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死敌。”<sup>①</sup> 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源泉，体现人类共同的美好的人性追求，代表整个国民集合体或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超越了各个阶级的普通的自我或阶级局限性，因而可以引导英国社会克服危机走出困境。阿诺德文化政治理想显示出精英主义的文化旨趣。

当时的报刊称呼阿诺德为“文化先知”“文化使徒”或“文雅的耶利米”<sup>②</sup>，阿诺德亦甘于肩负传播文化宗教的文化使徒重任。他指出：“这是真正社会性的主张；文化人是真正平等的文化使徒。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sup>③</sup> 阿诺德认为，文化使徒的工作虽然没有议员和政客那样的轰动效应，虽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但却像苏格拉底传播真理那样更深刻有力，更具深远弥久的、潜移默化的效果。此外，中世纪的亚伯拉罕、18世纪的莱辛和赫尔德也是这样的文化使者。在英国近现代学术史中，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首次如此自觉和明确地强调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为后来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尽管他所彰显的文学文化难免曲高和寡，却为日后英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奠定了基础。

#### 四 最早表现出跨学科视野、大文学观念与文化批评意识

阿诺德高度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化教育在英国社会文化理想重建工程中的独特价值。阿诺德指出：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使人了解世界上知识和思想的精华，帮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相”，从而创造自由、智性而新鲜的思想潮流，促进伟大诗人的诞生和文化繁荣时代的到来。文学批评应当公允无私，为诗人的创造性能力提供新思想，营造合适的智力局面和社会氛围。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超越了纯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具有跨学科的文化批评的旨趣；同时，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也超越了狭隘的英国文学批评的局限，而具有比较文学批评的视野，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意识。

阿诺德关于批评的职责是帮助世人认清“事物本相”的说法早在他的《论荷马史诗的译本》（1860）中就已经论及：“许多年以来，法国和德国文学的主要努力，正如整个大陆知识界的一贯努力所做的那样，在于一种批评活动；在各个知识领域，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都致力于如实认清事物之本相（to see the object 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sup>④</sup> 在牛津大学演讲《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1864）中，阿诺德重申了这一观

① [德]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96 页。

② 同上书，第 3 页。

③ 同上书，第 31 页。

④ 参见 [德] 阿诺德《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9 页。

点,指出,批评的任务是“就知识的所有部门,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探寻事物本来的真面目”<sup>①</sup>,亦即是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些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sup>②</sup>。上述批评理念在随后的集大成之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社会与政治批评》(1869)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充实与完善。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更是反复强调,文学批评不以宗派和党派的利益为转移而进行客观公允的思考,批评的职责是培育智慧和洞察力,旨在帮助世人洞悉“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sup>③</sup>。从而促使英国走出目前的困境,社会得到更加有序、和谐的发展。这样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审美的批评,而且也是“文化的批评”“社会和政治的批评”。这也是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副标题所要传达的旨趣: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政治与社会批评”。

在深刻社会转型时期的维多利亚英国,没有法德等国那样的哲学大家来承担社会价值重建的艰巨任务,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了像阿诺德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的肩上。阿诺德的批评理念具有强烈的道德动机,在最高层面上甚至要替代宗教。阿诺德在《论诗》(1880)一文中明确提出诗歌将取代宗教,因为诗歌具有美好与光明的属性,能给人们带来心灵抚慰和引导功能。他指出:“人们逐渐地会发现我们必须求助于诗来解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没有诗,我们的科学就要显得不完备;而今天我们大部分当做宗教或哲学看的東西,也将为诗所代替。”<sup>④</sup>这里的“诗”,从广义上可推及整个文学和文化。阿诺德秉持一种大文学观念,兼顾诗与泛文学,精通英国文学与西方古典语文学,打通文学与政治、宗教、社会、教育、道德等学科。强调“文化要通过客观的主动的阅读、思考、观察等手段,去了解最优秀的知识”<sup>⑤</sup>。他以“好奇”之心,广泛汲取与传播一切有利于实现人类完美的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以此抵制资本主义外在的机械工业文明。

阿诺德所谓的文化,其核心是古典文化和精英文化。他指出,只有通过阅读古典名著,才能使大多数人得以接触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思想。“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和诗歌是诗教合一的,关于美、关于人性全面达到完美的思想,结合宗教的虔敬,成为其充满活力的运作的动因。唯其如此,希腊的优秀诗歌艺术对我们至关重要,能给我们以重大启示(陶案,即给人以美好、光明与人性全面完善的思想启迪)。”<sup>⑥</sup>除了来自希腊以荷马、索福克斯勒、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伟大传统,还包括近代以来英国弥尔顿、莎

① 见伍鑫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③ [德]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8页。

④ [德]阿诺德:《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⑤ [德]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6页。

⑥ 同上书,第17页。

士比亚、华兹华斯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诸如但丁、歌德、洪堡特、海涅、圣伯夫与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化经典。阿诺德以其广博深邃的文学文化意识克服了英国非力士人的狭隘岛国之气。更进一步，阿诺德认为，在追求完美理想方面，文化不仅与宗教有内在一致性，而且比宗教更为优越。“文化在寻求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解，不仅倾听宗教的声音，还要听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和历史的聲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宗教说：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同样，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sup>①</sup> 并且，文化比宗教更能促进人的完美的思考和情感的天赋秉性和谐有效地发展。文化更能以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所构成之完美，促进构成人性之完美的能力和价值的和谐发展，而不是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

马修·阿诺德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始于任职牛津大学诗学教授期间，在盛期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得到完备的阐发。1857—1867年十年间，阿诺德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的诗歌（诗学）讲座教授。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诗歌评论，做了不少有关文学的讲座，确立了其批评家的地位。在《批评在当今的功用》（1864）这个最著名的讲座中，阿诺德开门见山地提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具有巨大的力量。作家创作固然需要创造力，批评家同样也离不开创造力。而且，批评的契机应该先于真正创作活动的契机。批评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一种便于创造力有所收益地加以利用的学术局面。他将维多利亚时期享有盛名的诗人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进行对比，与狂飙洪流中的歌德的创作进行对比，与伯利克里时代雅典诗人品达罗斯、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进行对比，逐一评点这些维多利亚诗人的作品的缺陷和不足。在他看来，维多利亚时代就诗歌创作而言，实在是个贫乏的时代。这些维多利亚诗人才华学识兼备，但其诗歌缺乏激情充沛之力，原因就在于此时的英国既没有像我们在伊丽莎白年代所具有的全民族的生活与思想的光辉，也没有像在德意志所发现的那种文化和那种研究与批评的力量。因此，批评乃提供信息、解放思想的创造之前的重要准备阶段。批评家可以见出和引导未来的发展趋势，批评有助于新思想的诞生。批评应保持“超然无执”（disinterested）的独立性：“远离实践；断然服从本性的规律，也就是对于所接触的全部事物展开一个精神的自由运用；坚决不让自己去帮助关于思想的任何外在的、政治的、实际的考虑（批评之目的是）。创造出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sup>②</sup> 随着新思想的触动和增长，文学创作的繁荣时代也随之而来。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他（阿诺德）相信自己在为英国文学新的繁荣铺平道路，相信英国所需要的唯独是批评，批判精神，从国外和往昔涌入的新思想。”<sup>③</sup>

① [德]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0 页。

②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1 页。

③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0 页。

阿诺德的批评理论并非大而无当的抽象原则，而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批评方法。阿诺德认为，文化批评首先是一种阅读，而非干枯的评价。1880年，阿诺德应邀为《英国诗人选集（The English Poets）》作总序，在题为《论诗（The Study of Poetry，又译作〈诗歌研究〉）》的序言中，阿诺德提出：“把大诗家的一些诗的字句，牢记在心，并用它们当作试金石应用到别人的诗上，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什么是属于真正优秀一级的，因而对我们是最有好处的诗；其实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sup>①</sup>阿诺德精辟地指出，批评家与其费尽心思抽象地找出构成诗的最高品质的东西，不如求助于具体的例证<sup>②</sup>。因此，他亲自编辑文学经典，强调对文学经典的细读，以伟大的古典作品作为试金石，以纠正单一的历史评价和个人评价。他精心挑选了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等人作品的精华诗句，以此作为“试金石”进行诗歌评论。他的这一批评方法对后来的F. R. 利维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巨擘，阿诺德的批评并非狭隘的语言批评和审美批评，而是广义的文化批评、人生批评。其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等文化批评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都是为了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这一目标而做的努力。因为诗与文化都是以追求美好与光明为旨趣。“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sup>③</sup>批评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对生活的批判精神，一种源于希腊文化的智性精神，即对任何学科都运用智力，提倡超然、客观性、好奇心、灵活性以及温雅。这种批判精神益于自由交流思想的空气。“归根结底，诗是生活的批判；诗人的伟大，在于把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上，——应用到怎样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上。”<sup>④</sup>阿诺德勇敢地把批评触角伸向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对当时的大众文化如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予以关注，批评它们只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的普通自我。尽管阿诺德文化批评的态度略显保守，但他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在客观上开启了主流学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空间。正如斯道雷所言：“阿诺德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他开创了一个传统，一种考察大众文化的特殊方式，并在文化的领土上为大众文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与文明’传统。”<sup>⑤</sup>阿诺德的文化批评观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机器文明的反驳，开启了英国现代文化批评学科的先声。

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是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某种转向，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问世，表明英国文论已经走出浪漫主义时代而进入文化古典主义时代。阿诺德早在《评〈荷马史诗〉的译本》一文中就提出荷马史诗的英译本原则：为了保存和传达荷马

① [德]阿诺德：《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德]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④ [德]阿诺德：《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141页。

⑤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史诗的总的印象，可依据英语的表达特点做意译。宁可牺牲对原文文字的信实，也不可冒犯直译的危险而产生古怪和不自然的效果。阿诺德指出：“我们要重造的既是荷马的总印象，因而只对荷马文字忠实了而失去荷马总印象，就是对荷马的不忠实。”“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荷马距离我们这些英译读者的时代已经久远了；所以译文必须比荷马原文还要明显清楚；译文对于意思的连接，应比原文还要显豁。”<sup>①</sup>而且，阿诺德于1857年任职牛津大学诗歌讲座教授所做的第一个演讲《论文学中的现代因素》，首次用英语代替了拉丁语，成为牛津学术史上值得纪念的际会。也标志了历史主义进入了牛津官方的英国文学史，显示其将古典文学大众化与英国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双重努力。

阿诺德的文化批评理论得益于纽曼神父所发起的牛津运动宗教思潮的滋养。马修·阿诺德在牛津读书时，正赶上一场史称牛津运动的天主教“宗教运动”。尽管阿诺德（及其父亲）不完全赞成这场宗教改革运动，而主张复兴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宗教（阿诺德所主张的新信仰之核心不是上帝，而是诗和艺术的“甜美与光明”）；但阿诺德仍高度激赏牛津运动，认为它代表了人类对于和谐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它败北于中产阶级的庸俗的新教教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却虽败犹荣。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充满深情地写道：“牛津，从前的那个牛津，犯了很多错误，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失败了，孤立了，与现代世界脱节了。但是在牛津那美丽的地方，在优美温雅之中成长起来的牛津人，并没有放弃一个真谛，那就是认定优美温雅是全面的完美之基本品格。当我坚持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浸淫在牛津的信仰和传统之中了。……我们培育起的感情洪流冲蚀和削弱了对手们已经似已占领的阵地，我们保持着同未来的沟通联系。……牛津运动夭折了，败阵了，四处的海面都漂浮着我们的残骸……”<sup>②</sup>阿诺德所倡导的文化宗教乃是牛津精神追求美与雅的情感愿望的发扬光大，二者朝着同一目标而努力。阿诺德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必须要有广阔的基础，一定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美好与光明。我曾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地指出，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sup>③</sup>

## 五 简要的结语

阿诺德被誉为英国近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和现代批评理论的先驱者，他所倡导和

① 参见 [英] 阿诺德《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76页。

② [英]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24页。

③ 同上书，第31页。

推动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堪称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滥觞，体现了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特色，其巨大影响不但超越了他自己的国家和时代，而且超越了英语世界。由于他在文学和文化界的重大影响，阿诺德一直是英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被英美学界视为一位“永恒的批评家”。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在马修·阿诺德的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在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而阿诺德代表“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sup>①</sup>。显示出非凡的跨学科批评的气度！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韦勒克则认为，阿诺德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文化辩护书。“他既擅长场文学批评又有诗人兼博英国社会及文明的批评家的声望，所以卓尔不群。当今不论在英国还是在英国——尤其学术界中——人们依然受其影响。阿诺德的影响首先在于他的文化哲学而非他的文学批评，不过，20世纪批评家中的欧文·白璧德、托·斯·艾略特、弗·雷·利维斯、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眼界上显然跟他一脉相承。”<sup>②</sup> 诚哉斯言！例如，美国著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就深受阿诺德的影响，善于把文学与社会、文化及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且特里林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阿诺德的。特里林曾在该书中如此评价阿诺德：“当我们把阿诺德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考虑时，无论我们多么经常地注意到他的错误见解，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阿诺德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或不如说，他确实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特里林甚至断言道：“对说英语的民族而言，阿诺德就是批评之父。”<sup>③</sup> 此外，从《批评的剖析》一书的绪论《论辩式的前言》中，也见出阿诺德批评理论对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滋养。总之，作为英国人文批评传统的开山鼻祖，阿诺德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的批评理论，对20世纪英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在中国也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学人最早接触到阿诺德批评思想的当属辜鸿铭。1867年至1878年辜鸿铭先后留学英法德三国，受过良好的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古典文学的训练。在英期间，辜鸿铭曾师承过马修·阿诺德，深受其影响。阿诺德对中国文坛的进一步影响始于20世纪前期。阿诺德的美国传人白璧德为现代中国知识界培养了梅光迪、张歆海、吴宓、汤用彤、林语堂、梁实秋等11位著名学人。借此，阿诺德的文化批评理论在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张歆海还在白璧德

① [英]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中译本译者序言，第7页。

②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③ Lionel Trilling,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4), pp. 409, 410.

指导下，以论文《马修·阿诺德之尚古主义》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学衡派把阿诺德奉为新人文主义的先驱，翻译了阿诺德不少诗歌作品和批评文章，其文化保守主义受到阿诺德文化理论的深刻影响。此外，朱光潜、闻一多、胡先骕、钱钟书等批评家也都翻译过阿诺德的作品。改革开放后，阿诺德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学界更是日趋升温，其睿智深邃的文化理论继续给当今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批评家以新的启迪。